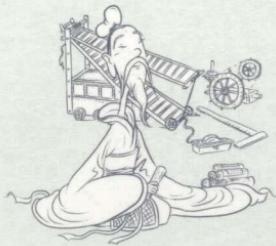


兼爱天下

施炎平 著

《墨子》 一日一语

倡导原典阅读，一日一句，受益终生
专家引读，享受中国式心灵鸡汤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读典
国学一日一语

兼爱天下

《墨子》
一日一语

施炎平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兼爱天下——《墨子》一日一语 / 施炎平著.—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1.10

(读典 国学一日一语)

ISBN 978-7-5339-3236-7

I. ①兼… II. ①施… III. ①墨家②墨子—通俗
读物 IV. ①B22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9134 号

丛书策划 丁 毅 柳明晔

丛书统筹 柳明晔

责任编辑 柳明晔

装帧设计 王 芳

封面绘图 单 炎

责任出版 朱毅平

兼爱天下

——《墨子》一日一语

施炎平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14 千字

印张 8.875

插页 1

版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236-7

定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001	导 言
021	人道精神之阐扬
041	贤能治国之提倡
071	人文宗教之设计
091	义利合一价值观之确立
114	知识、智慧之求索
141	教育、教化之推行



161	东方逻辑之展现
189	辩证思维之雏形
205	平民经济学说之初发
223	古典自然哲学之构建
239	中国传统科学之草创
259	备御军事理论之奠基

导

言

一、假如历史选择了墨家

解读《墨子》一书，领悟墨家（包括墨子和后期墨家）隽永格言的内在意蕴，剖析墨家思想的精义，很大程度上是现代人和古哲先贤之间的一场超越时空的“对话”。在面壁伏案、梳理墨家的历史演变，思考墨家思想价值和意义的过程中，我常常会突发奇想：假如历史选择了墨家，中国文化的精神面貌将会如何？假如墨家成了中国文化的正统，那中国人的气质心灵和传统特性又会怎样？

当然，墨子及其学派是属于历史的了。我们今天解读《墨子》，

研究墨家，首先应该将其归入历史学的范畴。而历史学研究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对历史事实的考察和评判是不可能也不应该采用“假如”来作说明的。但是，面对曾是“世之显学”并与儒家争相辉映过的墨家学派，回顾墨家经历的坎坷历史命运，直观墨家创建的博大精深的学说体系，透视墨家学说那极具特色、富于理论说服力和逻辑论辩性的思想内容时，我们不由得要发问：如此具有文化底蕴及精神价值的墨学何故会过早中绝？墨家何故被无情地排除出秦汉以后中国文化发展的正常轨道？历史又何故选择儒家为正统，而长期把墨家视为中国文化的歧流甚至异端？

追问这些“何故”，其实正是我们无法排遣对“假如历史选择了墨家”之类问题思考的表现。多年来，一直有许多颇为活跃的现代新儒家学者坚持不懈地为儒家辩护，张扬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和现代复兴的可能。他们著书立说，撰文讲演，做出种种努力来阐述和证明：儒家思想中内蕴的人文精神、仁政理想、道德理性和人格平等、天下为公等观念，不仅塑造了历史中国的泱泱大度和礼仪风范，而且还是重建社会文明和现代人生的精神资源及思想指导，甚至对于西方工业文明导致的功利化的人生是有效的救赎和超越。本人无意否定现代新儒家学者对儒学文明的执著与虔诚，也不否认儒家文化仍有其现代意义，更不想和现代新儒家学者就儒学的评价问题作全面争论，而只是想指出一点：把中国文化的全部价值都归结为儒学的价值，忽视以至排斥非儒学派，尤其是墨家学派的思想意蕴和精神内涵，这是有失公平公正的，也不符合实情。

从这样的意义上讲，提出“假如历史选择了墨家”的论题，作为解读《墨子》、评述墨家思想价值的参照，其目的是要联系整个

中国文化历史发展的背景，尤其以儒墨思想的比较考察为背景，来凸现墨学的意蕴和价值。以此为据，对墨家的隽永格言作现代诠释和感悟解读才有合理发挥的余地和依据。

思考“假如历史选择了墨家”的问题，还有深一层的意义：比起儒家来，墨家似乎为我们今天的现代文明提供了更多的传统资源和精神启示。许多西方人在探究现代科学文明的传统源头时，往往追溯到希腊人创建的形式逻辑体系和知识理性精神，同时把与科学文明相对应的价值追求归结于基督教传统。所以，西方人把逻辑、理性、宗教三者视为支撑西方文明的三大要素，作为西方文明优越于东方文明的主要根据。但同归属于西方世界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却指出：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毕竟做出来了。”（《给J.E.斯威策的信》，《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574页）

尽管爱因斯坦是以科学家的眼光，从西方文化的立场来观察中国，不认为中国曾经有过希腊式的形式逻辑体系和实验科学基础上对因果关系的思考，但他敏锐地揭示了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的科学发现和理论创造。问题在于：古代中国人究竟是靠什么逻辑、什么方法奠定和建构起那些科学发现和理论创造的？这确是令人惊奇、发人深省的。它促使我们思考：古代中国的逻辑观念、逻辑方法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如何探索其特殊内容和形式。这种思考，在对墨家文化的历史研究和现代诠释中，倒产生出了真正的

结果。人们可以相信，墨家不仅有其人道精神和道德理想，而且有颇成系统的逻辑思想、论辩方法，有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和科学观念，这些似乎足以和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理性传统相媲美，也可以为现代文明建设提供独特的资源借鉴。

二、“世之显学”的历史定位

本书以“墨家文化”为整体概念，将墨子、后期墨家及其对中国文化其他学派的思想渗透和影响，视为统一的发展系列。

墨子(约前468—前376)，春秋战国之际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技术专家及宗教家。后人多认为其生于鲁地，是鲁国人。史称墨子姓墨名翟，时人尊称为“子墨子”，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

但从历史考证的角度看，中国人以“墨”为姓氏的除墨子外，恐难有他人。自秦汉以来，太史公叙六家，刘向条列为九流十家，又“各以学术名其家”，意在标举各家学派之宗旨，却不以姓氏冠名某一学派。故孔丘称孔子，其开创学派非以孔家称而以“儒家”名。老聃(李耳)称老子，其所立学派亦以“道家”名而不称“老家”或“李家”。如此，何故要独称“墨子”和“墨家”呢？况且，墨之原意为古代五刑之一，即墨刑，指臣下犯君不恭，被判前额刺字，并染上黑色以作惩罚的标志。所以，墨又表示刑徒贱役。此外，墨子又极有生活规律，信守道义准则，恰如匠人之有“绳墨”。其为人甘于自苦，辛劳不已，致面目黧黑，形容枯槁，被荀子称为“瘠墨”。可见，“墨子”称谓之“墨”，主要不在是否为“姓”，而在内蕴的含

意。近人钱穆曾据江瑔之说，谓“墨”为道术之称，而非局限于姓氏。这可作为对“墨子”称谓的一种颇为合理的解释。

墨子之学被视为“役夫之道”，皆因墨子出身于下层，本人又是个技艺精湛的工匠。不过，这只是墨子身份的一个方面。综观墨子一生行事，工、士、侠的三位一体，似乎更能表达墨子的身份特点和人格气质。

庄子后学曾称赞墨子“好学而博”。墨子自己则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出游时也“载书甚多”（《贵义》），显然是自学成才，经自身努力由“工”上升为“士”。此外，墨子又极富侠风义气。他常基于社会公正和正义的信念，以惊人的毅力和牺牲精神果敢行事。史载墨子闻听公输般为楚造云梯攻宋，即日夜兼程，饥餐渴饮，“十日十夜而至楚”，并不顾死亡威胁，说服楚王停止攻宋，这极大地影响了墨家学派。《淮南子》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新语》也说“墨子之门多勇士”。而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是墨子学派的一贯作风，虽不足称游侠，然而确实具有侠士之风。以至近人康有为竟有“侠即墨也”一说。

墨家是墨子开创的学派。韩非子曾指出：“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可见，墨家本为“世之显学”，先秦时具有与儒家分庭抗礼、并驾齐驱的显赫地位。其原因当和墨子众多弟子广扬师说，大力扩大墨子思想影响有关。吕不韦就称：“（孔墨）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又说：“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吕氏春秋·当染》）史传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恐怕有点夸张，但墨子之弟子“弥众”，倒有具体数字可据。墨子在自齐往楚劝说楚王放

奔攻宋时，就讲到“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

墨子学派的形成及其历史定位，还可以通过儒墨关系的考察进一步加以确认。

儒墨两家有许多思想政治观点的分歧，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互相争论、互相驳难的情况。《墨子》一书曾专列《非儒》、《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等篇，针对儒家的礼乐观念、有命论思想做了尖锐的批判，指责儒家主张“靡财”、“厚葬”实在是助长“繁节仪式、淫乐奢侈风气”，“使天下贫困”。墨家的这种批判，因其曾经出入儒家营垒，深知儒家思想要义，很能契近儒家学派的命门。

据《淮南子·要略》篇的揭示：“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说：易也），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可见，墨家对儒家的批判还真有“反戈一击”的味道。这当然要引发儒家激烈的反批评。除孟子指责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外，荀子也专门对墨子的思想主张做过批判。《荀子·非十二子》在评判墨学弊端时用词十分尖锐，指斥其“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在荀子看来，墨家学说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为一家之说，然其不懂统一建国的权衡道理。崇尚功用，提倡简约，却非礼非乐，侵漫宗法等级秩序，又违逆君臣之礼，实属“欺惑愚众”。在《富国》篇中，荀子还多次批评墨子有关治国、理财、惠民的一些思想主张，指斥其言虽“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实际上“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

争驳难的一面，也有互补相容的另一面。法家韩非以儒墨同为世之显学，汉代又以儒墨并称，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儒墨有思想上的互通点。唐代大儒韩愈曾作《读墨子》文，认为“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而柳宗元则对于韩愈的“儒墨为用”的儒墨互补论点，进行了驳斥和批评，以至把墨家之言和杨子、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归为一类，视为与儒家“相訾毁抵牾而不合者”。（《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清代经学家俞樾则指出：“孔子贵公，墨子贵兼，其实则一。”（《墨子序》，载孙诒让著《墨子间诂》）这就是由唐延至清代学者围绕着“儒墨关系”展开的述说和争论的大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儒墨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化。

三、墨家学派的承继与沿革

孔墨以后，如同“儒分为八”（有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之儒）那样，出现了“墨离为三”的现象。

韩非说：“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韩非子·显学》）这是把墨子以后的墨家分为三派，我们一般称之为后期墨家。《吕氏春秋·去宥》曾提到“东方之墨者”和“秦之墨者”；《庄子·天下》亦有“南方之墨者”之说。可见，后期墨家的活动范围已扩大到华夏大地的东西南北，把墨子的思想主张系统地推行到诸侯列国，有力地促进了墨家思想的发展。

“墨离为三”的现象，是后期墨家对墨子原旨“取舍相反不同”，又皆自谓真墨而导致的结果。庄子就指出，相里氏、相夫氏、

邓陵氏之墨“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他们各以自己对墨子思想原旨的不同理解、阐发，自谓真墨而指斥对方为“别墨”，从而造成了墨子后学的分化。

“墨离为三”发生于战国中、后期，距墨子生活的时代有一百多年了。这期间，墨家学派的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后期墨家各派都有自己的主见。在与其他诸子学派的争论中，后期墨家主要就“坚白”、“同异”问题和惠施、公孙龙两派展开争论，以明辨墨与非墨，维护墨家的传统。与此同时，后期墨家内部各派也不断争论，“相谓别墨”，以区别真墨与别墨，确立墨道正统。

明辨墨与非墨，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墨家有严密的组织，其首领——巨子的产生亦有相应规范及程序，故墨家世传的系统也容易看清。历代治墨名家已据《庄子·天下》及《韩非子·显学》所述，列出墨家传授表，基本厘清了墨与非墨的界线（参见方授楚著《墨学源流》第七章，中华书局1934年版）。但要区别真墨与别墨，却颇不容易。因为墨家内部之各派，“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虽取舍相反，却都自谓真墨，缺乏一种客观的评判标准。如果都从自我出发，斥他人为别墨，那势必出现如韩非所说“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韩非子·显学》）的局面，就无法真正确定真墨与别墨之间的区别。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主张在严辨墨与非墨的学派差异的同时，适当淡化墨家内部的真墨与别墨，把墨子学派和后期墨家作为一个整体发展的系列来考察。

其实，在思想理论的层面上，从墨子到后期墨家的继承、沿革线索还是颇为清晰的，而且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在许多方面，后期墨家都继承了墨子思想的优良传统。例如维护兼爱学说，批判

儒家的“爱有差等”和宗法等级观念。在倡导“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观念的基础上，推进义利合一的价值观，发展墨家的功利主义和贵义论利他主义。尤其是后期墨家明确否定了早期墨家思想中“天志”、“明鬼”等宗教迷信和先验主义因素，克服其狭隘经验论，坚持了朴素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宇宙观。此外，后期墨家还把墨子的逻辑思想加以系统化，发展并提炼成形式逻辑的概念论、判断论和推理论，并表达了辩证逻辑的一些思想因素，建构了一个足以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体系相媲美的东方形式逻辑体系。对先秦时期的力学、光学、机械学、几何学和算学方面知识的概括与总结，使墨家成为古代中国最富于科学精神的一个学派。可见，墨家对丰富和繁荣先秦思想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文化的后来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

墨子和后期墨家的思想资料主要保留在《墨子》一书中。今通行本《墨子》是先秦墨家著作的汇编集，其书是汉代流传下来的。

《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有71篇，不分卷。《隋书·经籍志》则载“《墨子》十五卷，目一卷”。现通行的《墨子》本虽仍分15卷，但仅留有53篇，亡佚18篇。作为一部学派的著作，《墨子》各篇写作时间有先后，文体风格和思想观念也有变化和差异，显见作者并非一人，应看成是墨学发展过程中由墨子、墨子弟子及后期墨家陆续撰写、整理、增删而成的，总体上保留了墨子及整个墨家学派的思想风貌。

关于《墨子》各篇的真伪及其作者，历来是个争论颇多、较为复杂的问题。现综括学术界多数认同的意见，可以把《墨子》53篇分为五类：(一)从《亲士》到《三辩》7篇，其中前三篇有很浓的儒家

味，但不是伪作，属墨子早年学儒时期的作品；（二）从《尚贤》到《非儒》24篇，为战国时流行的问答式文体，系墨子讲述、后学整理而成；（三）《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等6篇，是为《墨辩》，时人亦称《墨经》，主要为后期墨家著作；（四）《耕柱》、《贵义》等5篇，相当于墨子的事迹传略；（五）《备城门》以下11篇，系墨子与其弟子讨论军事理论、城防技术和守御器械的。

《庄子·天下》所说墨家三派“俱诵《墨经》”的那个《墨经》，经后人考证是指《墨子》书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著作。晋代的鲁胜作《墨辩注》，序中说：“《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是以《墨经》和《墨辩》可通称。自此以后，《墨经》也常称《墨辩》。清代学者汪中首次把《墨子》书中的《大取》、《小取》二篇纳入《墨经》（《墨辩》）。他作《述学·墨子》，序称：“《经上》至《小取》六篇，当时谓之《墨经》。”而孙诒让撰《墨子间诂》，明确指出：“《墨经》即《墨辩》。今书《经》、《说》四篇，又《大取》、《小取》二篇，盖即相里子、邓陵子之论传诵而论说者也。”（《墨子后语》）

关于《墨辩》的作者，历来有两种意见。一说是墨子自著或部分自著，持此说者有清人毕沅、近人梁启超及李调甫、高亨等，但仅据鲁胜称墨子“作辩经以立名本”，似不可靠。一说是《墨辩》为后期墨家著作，清汪中、孙诒让考定《墨辩》形成相当于惠施、公孙龙的时代。近人胡适从《墨辩》文体风格、用语提法的角度论证其为后期墨家所作。当代学者冯友兰、张岱年、冯契等亦持此论。所以，学术界一般把《墨辩》6篇作为后期墨家作品，称之为广义的《墨经》，狭义的《墨经》则专指《经》上下、《经说》上下4篇。

问：“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墨子回答：“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熏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这“择务而从事”的十项论题，再加上墨子一贯主张的“非儒”，共十一项，组成了墨子思想体系的要目，又经后期墨家的引申、发展，广泛涉及人道论、宗教论、治政论、价值论、知识论、逻辑论、科学论、教育论、经济论、军事论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之间虽常有交杂、混合，其组建次序也非固定不变的，但内在有清晰的逻辑联系，反映了墨家思想体系已臻一定程度的成熟。

四、墨学纲领之辨正

说墨家思想体系有一定的成熟度，还因为墨家确已明显地围绕着一个中心观念进行阐述，并由此凸显了墨家的思想纲领。

史传“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吕氏春秋·不二》），似已有定论。墨子以“兼以易别”命题立论，倡导“兼爱”原则，批评“爱有差等”，表述了和儒家仁爱观念的分流与对峙。“兼爱”就成为墨家人道观以至墨家整个思想体系的中心观念。《汉书·艺文志》在论及墨家思想的特征时，以贵俭、兼爱、上（尚）贤、右鬼、非命、上（尚）同六者为“其所长也”，进而指出“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汉书·诸子略》），断定墨家思想之要旨在由“非礼”而进于“不知别亲疏”，讲的正是“兼爱”。所以，清代学者张惠言明确说：“墨子本在兼爱。而兼爱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也”（《书墨子经说解诂》）。

后人既认定“兼爱”为墨子思想学说之中心观念，则“兼爱”在墨学体系中并不仅仅是一种规范和原则。事实上，墨子还深入探讨了兼爱之源、人们何以要兼爱等问题，以智者的理性态度论述兼爱观念，把兼爱说发展成政治学、哲学、伦理学融为一体学说，体现了墨学之思想纲领的系统性。

《墨子·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还以医生“攻人之疾”为例，说明必知病人疾之所自起，才有疾之所能治，进而强调“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知乱”、“察乱”，是墨子倡导兼爱说的哲学基础和认识论前提。他认为：社会之乱“起不相爱”。这个结论虽不一定正确，但反映了墨子对社会悖乱现象的一种理性考察和认知把握，具有智者的精神气质。

墨子的社会认识思想，在后期墨家那里推广到对宇宙自然现象的考察，发展出墨学的宇宙论和科学思想，使兼爱说的伦理精神和理性态度有机结合，体现着爱智双修的思想指导。孙中山说过：“古时候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蔡元培亦说：“先秦惟子墨子颇治科学。”这些是对墨子爱智双修思想的认同。

墨子称兼爱为“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兼爱中》），而圣王讲爱是不分亲疏、贵贱、厚薄之别的，故强调“兼爱”应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兼爱上》）。他认为应该像爱自己那样去爱他人、爱天下人，使彼此的利益、天下人的利益兼而为一，这就把兼爱作为一种普遍的人道原则，用于解释和充实仁、义的内容，促成了义利合一观念的确立。

墨子说：“兼即仁矣，义矣。”（《兼爱下》）这种兼即仁、兼即义的观念，在后期墨家那里得到进一步的阐发。《经说上》有称“仁，